

没有一次牺牲不是壮烈的

— 无名氏韩人抗日题材小说论*

吴 敏**

目 次

- 导言
- I、导言
- II、历史考证：没有一次牺牲不是壮烈的
- III、艺术风格：抒情与叙事同样精彩
- IV、创作背景：以真人真事为素材
- V、结语

I、导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名氏是个传奇式的神秘人物。他在20世纪40年代，如一颗耀眼的流星划过文坛，随后便销声匿迹，似乎从人间蒸发了。时隔30余年后，无名氏又突然从芸芸众生中冒出来，而且向世人奉献了长篇巨著《无名书》系列的最后两部。原来，在无名氏蛰伏人间的岁月里，他始终有一种历史使命感，一直在默默地耕耘其史无前例的长篇巨制。

无名氏在20世纪80年代复出后，名声大噪，但评论家和文史学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其长篇巨著《无名书》上，大多关注其曾经引起“洛阳纸贵”的《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等名篇，至于无名氏的韩人抗日题材作品《红魔》（1943年9月）¹⁾、《龙窟》

* 本文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第四届韩中青年学者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

** 韩国外国语大学校中文系博士生，中国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miao_wu97@hotmail.com

(1943年10月)²⁾和《幻》(写作日期不详)³⁾,几乎无人研究或评论⁴⁾,更不用说去发掘其内在的文学和历史价值,甚至连研究无名氏的专著中,都绝口不提上述作品⁵⁾。当然,上述情况的出现,与三部作品均为残稿有关,可谓事出有因。无名氏在《龙窟》正文前的“作者注”中写道,这是“一个未完成的长篇的第一章与第二章,因此在故事发展上,这两篇是衔接的。这个长篇主题是写韩国的灭亡及国内革命,但我只写了原书的六分之一,就放弃了。此书所收第一章,只是初稿,尚未正式改定。第二章原共有九节,只写了六节,而其中只有前三节是初稿,第四、五、六三节则是草稿,尚未修改。因此,严格说来,这两个短篇,只能算是残稿,‘龙窟’更是残稿的残稿。但我现在却不想改正和增补了。收在这里,算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纪念”。在《幻》的正文前,无名氏又加注:“本篇为未完成的一个长篇断片,写韩国李王朝覆没的当夜李王心理反应”。既然作家如此低调注解《红魔》、《龙窟》和《幻》,大家似乎也就恭敬不如从命,权当这是作家的无足轻重之残篇。

但是,笔者以为,无名氏低调处理三篇韩人抗日题材作品,并非表示这些作品没有价值,否则,作者就不会将其收进小说或散文集中,而收编《红魔》和《龙窟》的小说集,还是以《龙窟》命名的。这至少表明,作者惜字如金,非常珍惜自己的每一部作品,哪怕《幻》这样的断片,也不想让其无故湮没。事实上,人们在读完上述作品后,确实感到“无名氏的这三篇短篇小说,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⁶⁾”。笔者认为,在中国现代作家的韩人形象作品中,《红魔》、《龙窟》和《幻》是三部不可忽视的作品。其理由是:

以题材而论,其他描写韩人形象的作品,都以流亡中国的韩人为素材,如台静农笔下的“邻居”,蛰伏在北京⁷⁾;舒群笔下的“果里”,逃亡于东北⁸⁾;巴金笔下的“金”,转战于

1) 载孔范今主编,《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卷四,(北京:明天出版社,1991)。

2) 同注释1)。

3) 载散文集《火烧的都门》,(上海:真善美图书出版公司,1949),在台湾再版时改名《蓬露》。

4) 迄今为止,笔者只找到一篇相关的论文,是邹志远撰写的「无名氏小说解读」,吉林: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5卷第1期,2002年3月。

5) 如赵江滨著,《从边缘到超越—现代文学史“零余者”无名氏学术肖像》中,附录了“无名氏年谱简编”,其中1943年的文学活动中,根本未提《红魔》、《龙窟》和《幻》的写作。(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165~166页。

6) 邹志远,「无名氏小说解读」,吉林: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5卷第1期,2002年3月。

7) 作于1926年。初收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北平:未名出版部,1928年11月)。

8) 约完成于1934年12月,1935年6、7月改定。1936年5月1日载《文学》第6卷第5号。初收短篇小

中国各地⁹⁾。郭沫若的《牧羊哀话》¹⁰⁾，虽然以韩国灭亡后的闵氏家族为题材，但只是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没有触及国内抗日的主题。唯有这几部作品，以韩国国内之军人乃至皇族内的反抗斗争为题材，甚至还有描述李朝末代皇帝的题材，从而弥补了韩人形象作品在题材上的狭隘性。

以人物形象观之，其他作品大都描写平民的反抗斗争，唯有这三个短篇，或描写韩国军人的绝地起义、集体哗变；或表现义兵首领的视死如归、大义凛然；或刻画皇室内部励志反日的新生代形象，从而丰富了韩人形象的画卷。由于这些作品的增补，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韩人抗日斗争形象，形成了内外呼应、上下一致、同仇敌忾的态势和图景。

从叙事方式看，其他作品多采用旁知观点叙事，如台静农小说中的“我”和“邻居”；蒋光慈小说中的“我”和“李孟汉”；舒群小说中的“我”和“果里”；巴金小说中的“我”和“金”，形成了“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之间的二元对立及互动关系。这三部作品则以全知观点叙事，作家站在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角度，叙述历史人物朴胜焕（又名朴性焕）、金左真、李康年的悲壮故事；描绘李萇、李范仪、闵圭植、李熙等历史人物的心路足迹，故而堪称历史小说或历史教科书，不但让中国读者深味了那段血腥的历史，也为那段历史作了很好的补充和注解。

在作品艺术方面，作者虽然谦称其为学习之作，但文本细读后，让人感到几部作品颇显无名氏的文学功力，体现了作者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机融合的独特风格。《红魔》、《龙窟》“疯狂恣肆的文体¹¹⁾”，与有张有弛的叙事融为一体；《幻》夜魂曲般的抒情，与深邃的心理刻画融为一体。同时，其构思之缜密精巧，已经清晰地勾勒出整部长篇的脉络；其义烈将士形象之丰满真实，使人掩卷难忘，从而凸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绝地反抗之主题；其情境设置、氛围渲染与场景烘托之娴熟老到，使作品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可以说，三部作品为读者“弹奏出一曲不灭的民族灵魂之歌，不朽的民族尊严之歌¹²⁾”。

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9月），1页。

9) 巴金作于1936年4月。载1936年5月15日的《作家》第1卷第2号。后收于短篇小说集《发的故事》，由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36年12月初版。

10) 作于1919年2、3月，1922年12月修改。载《新中国》月刊第1卷第7号，1919年11月15日。初收《星空》，（上海：泰东图书局，1923年10月）。现收卜庆华编，《郭沫若短篇小说集》，（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11) 刘志荣，《潜在写作：1949—197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58页。

II、历史考证：没有一次牺牲不是壮烈的

《红魔》所截取的事件，其实是20世纪初日本吞并韩国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朴真爽在《朝鲜简史》中写到：“1907年7月，朝鲜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高宗被迫退位，签订丁未条约，朝鲜军队被解散等等¹³⁾”。然而，或许是因为时逢多事之秋，重大事件纷至沓来，流血牺牲的壮士不计其数；或许是因为殖民语境下的朝鲜，流失了许多珍贵的抗日斗争史料，韩国近代史在记载韩国军队被解散这一重大事件时，通常简略而寥寥数笔。

如姜万杰的《韩国近代史》，对此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大韩帝国的政府军于1907年在日本的强制下被解散¹⁴⁾”。李元淳的《韩国史》写到：“以财政原因于八月解散军队，剥夺韩民族手中的刀、枪，使其无力反抗¹⁵⁾”。李清源的《朝鲜近代史》，对此作了略微具体的描述：“朝鲜士兵不愿解除武装，而且坚决反抗。他们占领了武器库，武装起来与日军作战。日军与侍卫第一联队第一大队的战斗特别惨烈，这次战斗发生在京城南大门与西大门之间的地区¹⁶⁾”。倒是中国学者编的另一本《朝鲜近代史》，对这一事件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当训练院忙于举行军队解散仪式时，南大门外的韩国士兵响起了起义抗日的枪声……步兵参领朴性焕开枪自杀，成为士兵起义的导火索。在参尉南相德的指挥下，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相继举行起义。起义军人夺去了日军占领的军火库，并以营房为阵地与日军展开殊死斗争。在汉城市民的支援下，起义士兵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击毙了包括日军大尉梶原在内的数十名官兵。后来，起义者弹尽粮绝，被迫退向农村，参加了以农民为主体的抗日义兵运动¹⁷⁾”。

12) 邹志远，「无名氏小说解读」，吉林：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5卷第1期，2002年3月。

13) 朴真爽、姜孟山、朴文一、金光洙、高敬洙编著，《朝鲜简史》，（吉林：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459页。

14) 【韩】姜万杰编著，贺剑城、周四川等译，《韩国近代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233页。

15) 【韩】李元淳等著，詹卓颖译《韩国史》，（台北：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319页。

16) [朝]李清源著，丁则良、夏禹文合译，《朝鲜近代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150页。

17) 曹中屏著，《朝鲜近代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255~256页。

与上述史书大相径庭，韩国近代著名学者朴殷植¹⁸⁾写于1915年的《韩国痛史》，详尽记述了军人们绝地哗变、血染沙场的壮举：“先是各军弹丸之收也，于是士兵愤怒齐声，大呼曰：弹丸军人之生命而欲夺之，何也，誓死不从。是日晓，大雨如注，自军部派传令骑兵急招各队长。侍卫第一联第一大队长朴胜焕，自乙未凶变以后，尝怀报酬之志……称疾不往，使中队长替行。及闻解散军队诏，忿剧若发狂，蹴床打椅，大声痛叹，慨宿志之未遂，宁溘然而殉义，遂引短枪自射而毙。在旁卫卒大惊，发哀苦声……队中将卒猝闻此声，相告语曰：队长死矣，队长死矣，一时忿气激发，直破弹药库，取出弹丸……第二联第一大队亦同声响应……于是，日本司令长官吹角呼军，聚数千，驰若风雨，环而攻之。韩兵从营内窗隙发射，杀大尉媿原及其卒百余名。日本人益怒，据南大门城壁发机关炮轰击……韩兵遂离营，突出与日本兵接战，互有杀伤。韩兵以弹尽溃走。日本兵遂夺营占之。因搜索乱射，尉官多惨死，闯入民家，恣行杀戮韩兵，死者百余人，负伤者百余人，被擒者五百十六人。父母妻子呼哭震天，腥血载涂，吁其惨矣¹⁹⁾。朴殷植生于1859年，历经韩国腥风血雨的岁月，军队遭遣散、军人们为民族尊严而血流成河的悲剧，历历在目，故读其上述文字，有悲愤交集、声泪俱下之感。

值得关注的是，史书与文学作品各有其社会使命，史料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源泉，增添文学的历史厚重感，甚至可以让作家依据“他者”史料，塑造“他者”的历史形象。但是，即使如《韩国痛史》详尽记载，也不可能像文学作品那样，尽情刻画人物、铺张情节，如此，赋予历史人物以生命的使命，就落在文学作品上。因为，在一个民族拼死抗争侵略者的历程中，没有一次牺牲不是壮烈的，哪怕牺牲的只是一介平民、一个普通的士兵；任何为国捐躯的精神和行为，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永久祭奠、发扬光大。我们可以用史书来树“无名英雄纪念碑”，更应当通过各种文学形式，让这些无名英雄活在后人心中。

颇有意味的是：弘扬韩国军魂之威严、壮烈的使命，竟然落在一个中国作家身上。正是无名氏，把这些几乎被史书湮没的壮士，虔诚地、庄重地托举出来，不但让中国读者知道了金左真、姜载河这样的英雄人物，也为那段历史作了很好的补充和注解。无名

18) 朴殷植 (1859~1925年)，朝鲜近代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朝鲜黄海道黄州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朝鲜后，流亡中国上海等地，客死中国。

19) 太白狂奴 (朴殷植) 原辑，《韩国痛史》，(大同编译局，1915)，283~286页。原文没有句读，系笔者添加。

氏无异于向世人宣告：火山终于喷发了，这是1907年的第一次喷发，因为韩国第一次被解除武装，投入殖民地的苦海。其实，这些士兵完全可以领取“赐恩金”后“各返旧业”，但是，他们选择了“毋宁死”。可以说，尽管有不少卖国求荣的败类，但这些英雄，才是韩民族的精神、灵魂和力量之所在。

《红魔》的历史和文学价值，即在于塑造了一位“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起义将领：金左真。他在大队长朴胜焕自杀，士兵们个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却又群龙无首之机，毅然挺身而出，振臂疾呼：“叫自己死不是办法！叫敌人死才是生路！”从而唤起了“复仇的暴风雨”，带领士兵们潮样的冲入军械库，夺取所有的军械弹药…杀了队上所有日本人…进攻日本驻屯军司令部”。这不由得让中国读者想起陈胜、吴广当年振聋发聩的高呼：“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²⁰⁾”陈胜、吴广的千年一呼：揭开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而金左真的世纪之唤，“点燃了半个世纪抗日独立运动的导火索²¹⁾”。1940年8月，值韩国军队解散33周年之际，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在重庆成立，其发表的《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报告书》庄严宣告：“丁未（1907）年8月1日，日本…阴谋解散韩国军队…韩国军队将驻扎汉城的日军全部击毙，鲜血染红了汉城市的街道…可以说…国防军解散之日，就是光复军成立之时²²⁾”。上述宣言，彰现出金左真式的将领，在韩国独立运动史上的不朽历史功勋。而作为文学形象，小说中的金左真，可谓铮铮硬汉，可以列为世界硬汉文学形象中的一员。他率众将士浴血搏斗，身受三处重伤，直至被敌人炮弹震晕过去；他在皇族诬蔑他们是乱兵逃兵时，突然破口大骂：“你妈的，这里没有什么乱兵逃兵，这里只有为祖国自由而受伤的人！你妈的，你忘记你的祖宗是哪一国人了！”在叙述起义经过时，他痛陈：“我们所有的只是一颗血淋淋红花花的心，不甘做猪狗的心…它要我们踏着兄弟与敌人的尸首前进！它要我们用头颅与胸膛堵住敌人的机关枪与炮口……只为了一个字：自尊！”尽管起义彻底失败，他在痛骂“我们不是被打败了的，我们是被出卖了！…打败我们的…是领导我们的将军们，是天天喊着救国救民的贤明官吏们！”的同时，仍然坚信：“我们这个民族必须真正死一次，将来才能活得像样点。”

与金左真的刚烈形象相衬映的，是坚忍不拔、忠心耿耿的姜载河。正是他，用泥水

20) 司马迁，《史记·世家二》，（北京：中华书局），1950页。

21) 韩国国家报勋处，《韩国独立运动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19页。

22) 韩国国家报勋处，《韩国独立运动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20页。

把金左真浇醒，并在队长宁死不肯走的情况下，趁黑把队长背出战场。又是他，为了拯救重伤的队长，不顾伤痛和疲惫，挨家挨户敲门恳求皇族让队长进去歇一歇，尽管一次又一次被拒绝，他仍然坚持着，终于找到了良心未泯的皇族李范仪及其儿子李箕，使金左真既躲过了日本宪兵的追捕，又获得了疗伤养息的时间。姜载河完全是一个普通士兵的形象，但在“留得青山在”这一点上，比金左真更有思想和远见，可谓朴素的平民英雄。在作家匠心独具的人物布局中，这四个人物代表了韩国的尊严、希望和未来，为长篇小说的后续作了铺垫。可惜的是，无名氏未完成预定的写作计划。

在人物形象上，《龙窟》向读者展现了义兵领袖李康年的烈士风范。关于李康年，史书记载韩国军队解散后，他最早点燃义兵战争之火，1907年8月10日，他率领部队占领了堤川；其后，他联合其他义兵，组成了二千多人的大部队²³⁾。1908年5月，他在奉化地区进行了2次战斗；1909年4月进攻全罗道茂长；同月中旬在咸平附近与日军展开7小时战斗²⁴⁾。1909年9月，日军开始对湖南地区义兵进行讨伐，共逮捕和枪杀了103名义兵将领²⁵⁾。从日军围剿的地区看，李康年当在此次被逮捕并枪决。但是，为了在小说中集中表现韩族的拼死抵抗，作者将李康年的英勇就义，提前到军队起义后的8月4日²⁶⁾。关于李康年等义兵首领的英勇牺牲，朴殷植在《韩国痛史》中写到：“皆慷慨死义…然此诸人之平生与起义成仁之事状，略有传闻，莫得其详，不得不俟他日之更采并冀他人之有述²⁷⁾”。朴老先生当然不会想到，一个中国作家将传闻敷演成形象的文字画卷，向世人描述了李康年慷慨激昂、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本色。

小说截取了李康年就义前被游街的片断，凸现了其“士可杀不可辱”的宁死不屈形象。他虽然“脸浮肿着，发青黄色，有破裂的伤痕和斑斑血迹”…“浑身上下被血渍渗透，两腿一瘸一拐的走着，双手被反剪在身后”…“但胸膛却昂然挺起，而且‘嘎哑而悲惨’的叫骂声不绝于耳：“大韩国就是你们的坟墓，总要把你们活活坑死”…“把我五马分尸！把我熬成膏油点天灯吧！你们只能毁灭我一个人，你们不能毁灭韩国三千万人”…“同胞

23) 韩国国家报勋处，《韩国独立运动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26页。

24) 朴真奭、姜孟山、朴文一、金光珠、高敬谏编著，《朝鲜简史》，462页。

25) 韩国国家报勋处，《韩国独立运动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28~29页。

26) 根据《红魔》和《龙窟》中的情节，起义从8月1日开始持续了二天，金左真在第三天早晨，被李范仪、李箕父子救进家里；当天，李范仪对李箕说，明天是你伯父的生日；是日，李箕参加完伯父生日宴会，走到街头，遇见被游街的李康年。

27) 朴殷植，《韩国痛史》，288页。原文没有句读，系笔者添加。

们！看他们打我的头！打我的眼睛！打我的身子！这就是做奴隶做亡国奴的下场！同胞们！起来啊！”可以说，李康年喊出了一切被奴役民族的尊严。

Ⅲ、艺术风格：抒情与叙事同样精彩

台湾地区有学者称无名氏的文笔“热辣辣浓得化不开²⁸⁾”。大陆亦有学者称无名氏的文体“意象太密，比喻太挤，色彩太浓，议论太杂²⁹⁾”；“激情狂放，辞彩绚烂，语言雕琢³⁰⁾”。其实，上述评论主要针对无名氏的后期作品，尤其是针对《无名书》的。陈思和曾经把《无名书》的文体比喻为“一座岩浆滚滚、喷发无度的火山”，认为“这是一个语言的角斗场，无数鲜蹦乱跳的意象在相撞、拼杀、爆炸，瞬间就变成尸骨成山，鲜血成河”以此“说明它那种泥沙俱下、泛滥成灾的语言特色³¹⁾”

但是，笔者在研读无名氏的韩人抗日题材小说后发现：这些作品“生命冲动”与客观叙事交替出现、相得益彰，形成了张扬铺张与简练写实相融合的独特文体。“生命冲动既是一种‘纯情绪性的心理状态’，也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运动状态，同时又是一种创造进化的自由意志³²⁾”。无名氏深受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在有感而发、有情欲抒；或者欲放大、凸现某种丑陋和美时，其文笔充满情绪性、运动性和自由意志，“有一种榨取生命内在感觉的刻意追求³³⁾”。然而，无名氏在叙述故事、描绘人物、展开情节时，却恪守着写现实主义的传统。依笔者之见，这也是无名氏一些小说使得“洛阳纸贵”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无名氏的韩人抗日题材小说，通常形成喧哗与沉静、浓彩与素朴之间的强烈对比，在他作品中，浪漫主义的夸张、抒情与写实主义的叙事、刻画同样精彩。换言之，无名氏在浪漫抒情时，通常极尽恣意狂肆的语言风格，任凭自己写作时的意识流，在笔端奔

28) 黄文范,「无名氏的文采」,文史哲出版社编委会编,《无名氏的文学作品探索与纪怀》,(台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2004),286页。

29) 刘志荣,《潜在写作:1949-197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59页。

30) 赵江滨,《从边缘到超越-现代文学史“零余者”无名氏学术肖像》,19页。

31) 陈思和,〈试论《无名书》〉,北京:当代作家评论,1998,第6期。

32) “生命冲动”是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生命哲学”中的核心概念。详见赵江滨,《从边缘到超越-现代文学史“零余者”无名氏学术肖像》,61-76页。

33) 赵江滨,《从边缘到超越-现代文学史“零余者”无名氏学术肖像》,19页。

腾跳跃；而在写实叙事时，则语言洗练、意识流畅连贯，无论在情境设置、氛围渲染与场景烘托上，还是构思缜密、情节张弛上，都娴熟老到，显示出深厚的现实主义功底，使作品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红魔》一开篇，就把读者带进了血与火、悲壮与狰狞的世界末日状态中。“火的海，烟的桅樯，炮的火山，子母弹声，开花弹声，马蹄的钢铁音乐，子弹的急奏曲，大厦倒塌了，巨墙滩陷了，梁栋崩溃了，雨后泥泞的飞雨，黄的雾、黑的雾，茶褐药、黄色药，沙土如千军万马……大地是蜜蜂的窠巢，千千万万凹凸凹凹的声音与颜色舞蹈着”。从这段具有代表性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揣摩到作者写作时瞬息万变的意识与想象：从火、烟、炮的形状，跳到子弹、马蹄的声响，又转回到遭破坏大厦、巨墙、梁栋的状态，再突入对战场烟雾的色彩描写，最后将形状、声音和色彩扭合在一起。作者用狂妄滥炸、激情跳跃式的描写，强烈地刺激着读者的视觉、听觉、嗅觉和触觉，使读者在懵懂中感受着战争的惨烈、敌人的凶残和战士的壮烈。正当读者在震撼与战栗中不知所措时，场景一瞬间“静默”下来，换成了皇族居住地的“冷寂”环境，而主人公也开始“仓促而蹒跚的摇晃着”进入了视野。

这种虚幻与实景的交替、喧嚣与沉静的对比所展现的“死里逃生”之情境，一下子就揪紧了读者的心，让读者急欲知道他们的身世和命运。然而，作者并不着急，欲按着“绝路逢生”的情境，进一步绷紧读者的神经。于是，两个血战了两天两夜，重伤在身、疲惫之极，又随时可能遭敌人搜捕而送命的幸存者，开始敲打皇亲国戚的家门，期望有点水喝，有东西充饥，最好能进屋躲一躲。但是，每一次敲门，不是被当作要饭的，就是被视为乱兵逃兵，遭到斩钉截铁的拒绝！乃至第6次敲门遭拒后，他们悲愤至极，在冷寂的街头撕心裂肺般地痛诉：“在这点钟里，我看见了三十年来我们屈辱的历史……我不能不流泪……我看见了……我们韩国是亡定了！”读到这里，笔者不能不想起中国乃至国际上当时形成的“集体想像物”，认为高丽之亡国，“皆国民纵容卖国派自取其咎³⁴⁾”。看来，它并非空穴来风，来自起义将领的“国骂”，骂得酣畅淋漓，骂出了亡国的根本原因、骂绝了卖国皇族的卑鄙嘴脸；同时，也骂出了朝鲜的希望之声！

这里，作者欲精心营造的，无非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情境。果然，在第7次敲门后，他们遇见了良知未泯的李范仪。不过，主人公就此进门获救是缺少

34) 崔龙水，「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比较研究」，《韩国研究论丛》(第七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56页。

戏剧性的，在以下的情节安排上，作者又一次施展其娴熟的叙事技巧，展现了“一波三折”的情境：先是仆人意外地没有一口回绝姜载河，说要请示主人；随后就出现了正在念佛的李范仪。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念佛往往是一种意象³⁵⁾，代表正直之人在不得志时“退而独善其身”。于是，听到了“放他们进来”的回答。正当读者不由得松口气时，李范仪却又反悔了，并招来仆人“国防军平日品行很不规矩”的附和。可以说，读者刚刚放下的心，一下子又吊了起来。就在这紧要关头，一个宏亮的声音突然响起来：“谁说国防军品行不规矩……品行不规矩的国防军，现在正为了韩国民族的尊严，在与日本强盗拼命！……正为了保护你、保护我，在与日本鬼子拼命！……现在正流出最后一滴血……侮辱国防军，就是侮辱韩国民族的人格，就是侮辱你自己！”好一个慷慨激昂的青年，那正是李范仪的儿子李箕。于是，李箕毅然让金左真、姜载河走进了家门。

与《红魔》一样，《龙窟》也是浓墨重彩开笔。不同的是，前者用血与火的狂轰滥炸凸现战斗的惨烈和残酷，后者则用酒肉歌舞的荒淫奢华，放大卖国皇族的厚颜无耻和挥霍无度，以及侵略者的张牙舞爪与狰狞伪善。值得关注的是，前章血肉横飞的场面，与酒肉奢华的寿宴，本身构成悲壮美与荒淫丑的强烈对比，读者刚刚从街头那场浴血抗战走出来，突然进入“舞女们狂烈得如一座座喷泉，一片片瀑布……酒液水样的流入人们咽喉中，杯盘声急响着……满座子是珠光宝气！满座子是琼枝玉叶……”的场景，顿时会厌恶、作呕得喘不过气来，觉得卖国贼卖的正是军人的魂，侵略者喝的就是战士的血。从中可以深切体味到作者构思的良苦用心。当李箕步入宴席时，作者的笔端一下子又平静下来，仿佛吹来一阵轻风，驱走了所有的乌烟瘴气。他径直找到坐在西北角的舅父闵圭植，那是他敬重之人，而闵圭植也不是同流合污之人。于是，他们互相问候、鼓励，谈健身、音乐，与周围“大韩帝国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的狂嚣声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幻》中，为了衬托李熙皇帝心死如灰的心境，作者不惜泼墨浓抹，极其铺张地描绘了死寂的宫殿。先是“月光青幽幽的纤纤手，哀伤的轻抚着会庆楼檐角的兽吻”。接着，月光下的“玉砌雕栏，精致壁饰，煌丽石刻，朱红大柱子，碧瓦雕甍，似乎全向一抹青色夜天投出怀疑问号，似在惊讶自己的凋落与被遗弃”。继而，“钟声可怕的固执的嘶吼着，会庆楼畔清碧如云的御河池，似响应着空洞的回音”。在层层铺垫下，主人公出现了，“在无边夜静中，他仿佛听见伊藤博文的沉重足步声。足步声似越响越近，要逼近

35) 比较文学中的意象，指文学作品中具有特定意义的文学形象或文化形象。参见刘萍，《比较文学论纲》，106页。

他。他吃了一惊……脑际立刻浮现一副奸险阴暗的面孔……这正是伊藤的面孔！面孔跟随他，已有十几年了……像一只死死逼近麋鹿的狮子……张着血盆大口，要把拥有四千多年历史的大韩王国一口吞下去”。虽然都是铺张的描写，但作者用宫殿死一般的静谧，与李熙内心“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悸动相对比，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悲剧效果。

IV、创作背景：以真人真事为素材

无名氏创作的韩人题材小说很多，其中大部分采自韩国流亡政府光复军参谋长李范奭(1900年~1972年)的生活³⁶)。如《北极风情画》、《露西亚之恋》等。无名氏创作《红魔》、《龙窟》和《幻》，显然受到李范奭的影响。据学者考证：1941年8月底，无名氏与李范奭相识，“李的职业军人加强烈民族主义者的气质，第一眼就打动了无名氏，从此两人过从甚密，并曾一度共居一室。李的丰富经历和浪漫传奇成了无名氏创作的重要素材来源³⁷)”。

笔者以为，李范奭对作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创作的动机。无名氏在《龙窟》的“作者注”中写到：这个长篇主题是写韩国的灭亡及国内革命。以无名氏的出身、经历，与韩国毫无关系，若无李范奭的存在，不可能突发奇想去写韩国的灭亡和革命。那么，无名氏的其他韩人题材小说，基本以李范奭的生平为题材，为何这部长篇要写韩国的近代史，尤其是从军队起义写起呢？笔者以为，一是李范奭为参谋长的韩国光复军，以1907年的国防军起义为成立日，这无疑给无名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军队被解散，即意味着国家已经名存实亡，而从光复事业看，解散之日的拼死抗争，亦即韩国新生之开始。但是，李范奭生于1900年10月，韩国军队遭遣散时，才6岁多，他15岁便从韩国流亡上海，投身于民族救亡运动，似乎不可能知悉整个事件的详情。因此，小说中关于国防军解散、起义的情节，受《韩国痛史》影响的可能性极大。朴殷植是韩国著名学者，长期流亡中国，他于1914年在上海写成《安义士重根传》、《韩国痛史》，1919年撰写《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这些著作在中国广

36) 赵江滨，《从边缘到超越—现代文学史“零余者”无名氏学术肖像》，19页。

37) 赵江滨，《从边缘到超越—现代文学史“零余者”无名氏学术肖像》，19页。

为流传，对帮助中国社会认识韩国悲剧，产生了很大影响。无名氏17岁（1934年）离家，独自出奔北京，在“北平的二十个月中，他先后阅读浏览了中外各类书籍达一千余册，几乎每天两册的程度³⁸⁾”，像《韩国痛史》这样广泛流传的有影响著作，想必读过，即使当时没有读，在产生写作动机后，也可以找来一读。笔者发现，《红魔》受《韩国痛史》影响之痕迹，随处可见。如其他史书均称朴性焕，惟有《韩国痛史》谓之朴胜焕，《红魔》中亦称朴胜焕。《韩国痛史》记载：朴胜焕称疾不往，使中队长替行，而金左真正是中队长。其实，历史中的人物，应当是参尉南相德。史书记载：“参尉南相德慷慨地向士兵们说：‘上将为国义死，吾安得独生，当与彼贼决一死战，上报国仇。’于是侍卫第一团第一营举行暴动³⁹⁾”。同时，《红魔》描述的军队举事过程，与《韩国痛史》的记载十分相似。

其二，人物的原型。从《红魔》和《龙窟》中主要人物李箕的出身、年龄和性格看，李范奭无疑是其原型。李范奭是汉城钟路人，韩国李氏王族的后裔，这与李箕的皇族身份完全相符。1913年，年仅13岁的李范奭结识了韩国民族复兴运动领袖吕运亨，投身韩民族的复国运动。1915年11月，李随吕运亨乔装成日本学生经鸭绿江铁路亡命中国，到上海参加了韩国流亡者的复国运动。⁴⁰⁾这与少年李箕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经历完全一致。小说中的李箕，“有一双野兽般强烈的狮子眼，一付傲岸的高高鼻梁”，他在父亲犹豫不决时，以斩钉截铁的决定收留了金左真；他在日本宪兵押着李康年游街，而围观民众冷漠无语时，悲痛地吼叫起来：“都是死人么？一个个都是死人么？……韩国人都是死人么？……韩国人都是死人么？打死这几个日本强盗啊！打死这几个日本混蛋啊！”他一边喊一边猛然推开身边的人，用力向前挤去，想冲到囚犯面前，显示出超人的气概和勇气；而李范奭在其抗日生涯中，以勇猛著称。可以说，他们都是同一类型的勇士，李箕正是少年时代的李范奭，而李范奭则是叱咤风云于战场上的李箕，只是无名氏没有把长篇进行到底。

半个世纪后，李范奭生前的亲朋好友，在韩国举行《北极风情画》最新韩译本出版纪念会，邀请无名氏参加，并称他为韩国革命的老战友。这令无名氏大为感动，当场发表了感慨不已的演讲：“我万万想不到，半个世纪前，我偶然为韩国革命事业做了一点一

38) 赵江滨，《从边缘到超越—现代文学史“零余者”无名氏学术肖像》，17页。

39) 朴真爽、姜孟山、朴文一、金光洙、高敬洙编著，《朝鲜简史》，460页。

40) 龙东林，「韩国传奇英雄的昆明缘」，《都市时报》2006年3月1日。

个人应该做的事，而在半个世纪之后，高贵的韩国朋友们竟还记得我所做的，还特别安排今晚这个盛会，以及其他文化活动，来答谢当年我对韩国革命所奉献的一点点友谊⁴¹⁾”。

不知为什么，读了这段文字，笔者总觉得有点遗憾，甚至有点淡淡的哀伤，李范爽是夏国元勋之一，当然值得纪念，《北极风情画》曾经洛阳纸贵，当然应当一版再版。可是，战士们的血染足迹，与将军们的同样珍贵；战士们的英勇献身，与将军的同样壮烈，一个世纪前那场血腥起义中牺牲的壮士，不知还有没有人祭奠？无名氏的《红魔》、《龙窟》和《幻》，不知有没有韩译本？也许，笔者的想法有些苛求，这些作品不过是片断而已。真的，无名氏为何不把这些片断连成长篇呢？

有学者认为，无名氏的这三个短篇，“并非一个系列”，“也没有形成长篇小说体系⁴²⁾”，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从叙事时间上说，三个短篇具有连续性：《红魔》记叙1907年8月1、2、3日发生的事件；《龙窟》叙述8月4日发生的一切；而《幻》则是8月22日的事情，这一天是日韩合邦的日子。从小说整个构架看，军队被解散、义兵被镇压和日韩合邦，可谓韩国灭亡的三步曲，正符合无名氏“写韩国的灭亡及国内革命”的旨意，作者欲表现的主题，正是大韩民族死而后生的艰难历程。那么，接下来的篇章，应该是写国内革命了，为此，无名氏在《红魔》和《龙窟》的字里行间，已经作了充分的布局，留下了清晰的线索和伏笔。依笔者之见，小说将顺着四条线索展开：一是金左真和姜载河的东山再起；二是李箕、张麟、申泳义等“自强体学会”的政治运动；三是《龙窟》结尾处提到的各地军队哗变、义兵起事；四是李范仪、闵圭植等不甘做奴隶和走狗的皇族们，暗中支持、伺机反抗。

既然如此，无名氏为什么不把长篇写完呢？邹志远认为：“笔者实在不知无名氏的整个长篇小说的结构设计策略，其实到小说《幻》止，作者的结构业已完成，它已然明晰了‘史’的进程。我想这也许是无名氏未完成这部长篇小说的根本所在吧⁴³⁾”。按照上述观点，无名氏是因为构思失败，所以写不下去了。但是，邹志远实在是疏忽了，无名氏说得清清楚楚，他要“写韩国的灭亡及国内革命”，小说刚刚写到灭亡，怎么会结构业已完成呢？金左真、姜载河、李箕、张麟、申泳义，乃至李范仪、闵圭植才刚刚亮相，还未

41) 无名氏，「在生命的光环上跳舞·初入汉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50页。

42) 邹志远，「无名氏小说解读」。

43) 邹志远，「无名氏小说解读」。

来得及施展手脚，怎么戏就要闭幕呢？其实，无名氏未写完的原因很简单：当年，他社会活动过于繁多，又四面出击，同时在写许多作品，以至于难以顾及及彼；其后，他开始构思六卷巨著《无名书》，便决心放弃韩人题材小说（如《亚细亚狂人》）的写作，并自己为自己找了个理由：“我非韩人，写异邦事难免有点隔阂⁴⁴⁾”。

《红魔》写于1943年9月，《龙窟》完成于1943年10月，所以，应当看看无名氏在1943年及往后的活动。他兼任重庆《新蜀报》、贵阳《中央日报》驻西北特派员，除为二报写通讯、文章外，又在西安各报发表作品，并为韩国光复军作了不少宣传，同时撰写《亚细亚狂人》；11月，《华北新闻》总编辑约无名氏为该报写长篇连载，无名氏奋笔疾书，每日平均写七千余字，写成14万字的《北极艳遇》（后改名《北极风情画》）。看来，写长篇连载《北极艳遇》，是《龙窟》未写下去的直接原因。其后，无名氏于1944年创作长篇《一百万年以前》和中篇《塔里的女人》；进入1945年后，他独自隐居重庆长江南岸山中，静心构思《无名书》；1946年又躲进杭州慧心庵，息交绝游，费时5个半月，完成《无名书》的第一卷《野兽、野兽、野兽》⁴⁵⁾。于是，这部长篇小说，就永远不会诞生了。

真的有点可惜，否则，无名氏真的可以弹奏出一曲不灭的民族灵魂之歌，不朽的民族尊严之歌，为韩国的军魂、民族魂，为默默无闻的战士们树一块丰碑。如此，这部完成的长篇，也会像《北极风情画》一样，在韩国一版再版，无名氏作为“韩国革命的老战友”，也就名副其实。

V、结语

作为一名中国作家，写自己从未去过的韩国，而且要写这个国家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本身就需要非凡的勇气。想当年，无名氏正值年少气盛的26岁，受身边李范奭等韩国军人事迹的感染，决心要以“一颗鲜红的心捧献给这些失意的灵魂们”⁴⁶⁾。其实，这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与两国、两族悠久而深远的传统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要言之，无名氏

44) 赵江滨著，《从边缘到超越—现代文学史“零余者”无名氏学术肖像》，167页。

45) 赵江滨著，《从边缘到超越—现代文学史“零余者”无名氏学术肖像》，167页。

46) 无名氏，「在生命的光环上跳舞·初入汉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51页。

可以驾轻就熟地用中国传统文化、文学中的美，去凝视、关照“他者”形象。如“李康年”的形象，是在“大义凛然”、“士可杀不可辱”、“视死如归”等一系列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情境中形成的；“金左真”的形象，则是“横空出世”、“绝路起义”、“义无反顾”等一系列情境的产物；李熙在“国破山河在”情境下“心死如灰”的心路，是在中国读者熟悉的玉砌雕栏、精致壁饰、煌丽石刻、朱红柱子、碧瓦雕甍等场景下，配上凄冷的月光烘托出来的。这种中国传统美的关照，很容易移花接木到“他者”身上；反言之，则韩人形象更易于用中国传统的美来关照。这无疑是比较文学中应当关注的一个话题，即“他者”形象塑造者与“他者”之间文化距离的远近，对于塑造出何种美学形象，是有决定性影响的。同时，笔者还发现，由于共同的文化背景，韩族英雄形象更容易为中国社会所接受。蒋光慈的《鸭绿江上》大获成功，舒群因《没有祖国的孩子》而一举成名，都是明证。这些作品的成功，无疑鼓励了一些作家，吸引他们去创作韩人题材的作品，无名氏似乎也在其中。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韩人形象作品一时间集中涌现的原因之一。

无名氏的文学生涯，大致可以分为“入世”和“遁世”两个阶段。概言之，以抗日战争胜利的1945年为界，之前的无名氏是积极入世的，之后的无名氏，则隐姓埋名，热衷于对“形而上”人生哲学问题的探索，具体而言，即转入“人的生命探索和精神探索”，“高度注意人的生命探索和精神探索在解决时代问题时的基本和核心地位⁴⁷⁾”。区分无名氏“入世”还是“遁世”阶段的创作，对于研读、理解无名氏的作品，具有重要意义。《红魔》和《龙窟》创作之时，正是无名氏积极参与抗战，与韩国抗日将领过往甚密的阶段，其作品不能不受到时代的影响，其重要标志，就是热衷于“英雄叙事”。纵观“五四”以来的各种现代文学作品，就会发现：这种英雄叙事，并不是殖民语境下个别作家的偶然文学行为，而是近代中国在历经腥风血雨、饱受奇耻大辱后的一种求生存、图强大的共同诉求。从梁启超、严复开始的文化先驱，到陈独秀、鲁迅等“五四文学”的旗手，都强烈意识到对国民进行英雄教育的启蒙作用，积极提倡建构民族的英雄神话。陈独秀主张：“大英雄之事迹，排成新戏，做得忠孝义烈，唱得激昂慷慨，于世道人心极有益⁴⁸⁾”。鲁迅激赏：“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⁴⁹⁾”。这种努力得到了“五四”文人的积极响应，与此相应的实

47) 刘志荣，《潜在写作：1949-197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57页。

48) 陈独秀，「论戏曲」，原载《新小说》第2卷第2期，1905。转引自王锺陵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古代）·小说戏曲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511页。

践，便是作家们大量的英雄叙事创作和译作，其目的都是为了救亡图存、启蒙图强，最终在中国建立足以与西方列强抗衡的、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因此，无名氏塑造的金左真、姜戟河、李箕、李康年，正是“英雄叙事”主旋律的延伸和变奏，其变化在于：描绘、刻画了殖民语境下拼死抵抗、浴血抗日的“他者”英雄。从这一角度考虑，韩人抗日形象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作用，已远远超过了以往的“英雄叙事”。这些形象对侵略者、殖民主义者无疑是一种强烈警示：如果有人胆敢重蹈覆辙，那么，这个民族的每个人，都可能是尖刀和炸弹，这种揭示和鼓动在当时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效用。

文学作品中的“他者”形象，“只是混杂着‘注视者’情绪和观念的对异己文化的印象⁵⁰⁾”，作者以形象化方式欲传达的，正是其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范式。朝鲜半岛的兴亡，是近代中国兴亡的重要参照物，因而，中国人对韩国的认识，往往与中国的历史境遇、国际国内环境密切相关。对于大韩帝国灭亡一事，虽然中国人普遍谴责日本的背信弃义和侵略行径，但为了唤起国民，追求自强，中国人又往往更愿意从其内部来寻找亡国原因。同时，近代中国的韩国认识，又往往受到历史记忆和地政关系的影响，对宗藩关系的记忆，增进了中国人对支援韩国独立运动的责任感；支援韩国独立运动，也是因为朝鲜半岛对于中国来说有重要的地政学意义，关系到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和平与安全。这种对韩认识的复杂性，体现了近代中国“他者”认识与“自我”认识的相关性。上述“社会集体想象物”，无疑对无名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对皇族卖国求荣的丑态，作了入木三分的鞭鞑，令人读来气愤作呕；在李康年游街的场面上，作者特意安排了四个日本宪兵与满街民众的对峙，这种悬殊的力量对比，本身就凸现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以及民众的胆小怕事、冷漠偷安，让人产生“世人皆醉我独醒”的英雄式悲哀。当然，作品的主基调是英雄叙述，从字里行间，可以读到无名氏充满激情的赞颂和愤怒，的确是“将一颗鲜红的心捧献给这些失意的灵魂们”。

无名氏已是作古之人，《红魔》、《龙窟》和《幻》，也就注定要遗憾地定格在残稿上。笔者探讨这些不为世人关注的作品，旨在全面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韩人题材小说，也期望唤起学界对无名氏前期文学作品的重视和研究。

49)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118页。

50) 张弘，《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5页。

参考书目

- 孔范今主编,《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卷四,北京,明天出版社,1991。
- 无名氏,《火烧的都门》,上海,真善美图书出版公司,1949。
- 邹志远:〈无名氏小说解读〉,吉林,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5卷第1期,2002。
- 刘志荣,《潜在写作:1949-197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 朴真爽、姜孟山、朴文一、金光洙、高敬洙编著,《朝鲜简史》,吉林,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
- 曹中屏,《朝鲜近代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 太白狂奴(朴殷植),《韩国痛史》,大同编译局,1915。
- 韩国国家报勋处,《韩国独立运动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
- 【韩】姜万杰编著,贺剑城、周四川等译,《韩国近代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 【韩】李元淳等著,詹卓颖译,《韩国史》,台北,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
- 【朝】李清源著,丁则良、夏禹文合译,《朝鲜近代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

<Abstract>

Any sacrifice is heroical

- The discussion on the novels for Sino-Japanese War written by Wu Ming Shi

Wu Min

From the literature interior and exterior, the article researched separately and detailedly to three novels written by Wu Ming Shi on the Korean's resistance to Japanese. After analysing to their artistic technique, the article pointed out that

the novels written by Wu Ming Shi have mixed expanse and expatiation with simpleness and realism.

It is the extension and variation of "narration on hero", enthused over by enlightening writers in May 4th movement that Wu Ming Shi described and craved "others" hero. It expressed relativity of recognition between "others" and "ego" in modern China. The aim to discuss these "no attention" works is to research the novels on Korean in the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completely and to call out attention and research to the early works written by Wu Ming Shi in academe.

Key words Wu Ming Shi, Korean theme, Sino-Japanese War, narration on hero

투 고 일 : 2008년 1월 10일 / 게재확정일 : 2008년 2월 15일
